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41

中共党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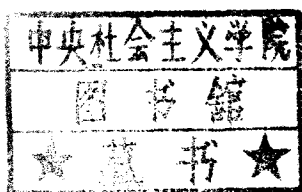
D239
613

82197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年·北京

(京)新登字 071 号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 1929 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百善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8.25 印张 159 千字

199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500 册

ISBN 7-80023-456-8/K · 445

定 价: 3.50 元

DAH 109

目 录

文 献

切实抓好党的组织建设工作	罗荣桓 (1)
--------------------	-----------

回 忆 录

终生难忘的怀念	莫文骅 (6)
走出祁连山	赵正洪 (39)
抗战时期在皖南	李一氓 (60)
北线第一个大胜利	杨斯德 (111)
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的组建	郭化若 (130)

人 物 介 绍

1973 年周恩来回延安	刘 静 (139)
陈延年同志二三事	徐彬如 (151)
刘长胜传略	江柯林 (157)

专题资料

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后五年

斗争概述 邓礼峰 (188)

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 郑 谦 (204)

译文选登

去延安.....〔日〕野坂参三 韩凤琴译 (234)

小 资 料

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宣传

机构——《中国工人通信社》 程慎元 (253)

切实抓好党的组织建设工作*

罗 荣 桓

军委确定，明年部队的工作还是以贯彻创造四好连队为中心。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已经作了详细讨论。组织部门的任务，就是要从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面保证这个中心工作的胜利完成。

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关系最密切，一切工作都靠党的组织活动去实现，因此组织部门应经常关心中心工作。但是不能说“组织部门就是管中心工作的”，这个提法不妥当。组织部门是管党的组织工作的业务部门，它的工作主要是抓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组织建设搞好了，就可以从组织上保证中心工作的完成。因此，组织部门必须紧紧抓住党的组织建设工作，要抓住不放，放了，组织部门就失去工作中心，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创造四好连队运动中，一定要抓好支部建设。连队以党支部为核心，连队工作靠党支部的领导，党支部搞好了，连队才能实现四好的要求。

* 这是罗荣桓同志 1961 年 11 月 15 日在全军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关于目前党的组织建设，主要应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加强党的教育。一年来，发展党员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部队增加了大批新党员，同时，超期服役的的士兵多了，党的骨干相对地稳定下来了，因此，今后发展党员应作为一项经常的工作去进行。明年重点要放在加强党的教育，提高党员质量方面。现在连队党支部预备党员的数量很大，有些支部的骨干也是近一两年才入党的，缺乏党的基本知识，对他们不好好地进行教育，就不能很好发挥党员的作用。加强党的教育，提高党员质量，是建党的根本问题，明年一定要抓好这件工作。

健全和活跃党的生活。各级党的组织要把党的会议开好，要使党内民主生活活跃起来。现在有些党委和支部不懂得怎样开会，往往会前缺乏准备，没有一个酝酿过程。这种做法是不好的。一个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开会要讨论的问题，不事先给委员出“安民告示”，让大家知道会议内容，早作准备，充分考虑，会议必然解决不了问题。有的单位开两个钟头会，书记一个人就讲了一个多钟头，这很不好。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开会的方法，在会前先出“安民告示”，使大家有充分准备，会上让大家畅所欲言，反复讨论，最后归纳起来，作出决定。这样就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集中集体的智慧。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办事，把党的生活活跃起来，要象毛主席指示的那样，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过去

几次政治思想运动中，有些单位发生一些偏差，目前有些单位党的组织纪律有些松弛，这些都与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有关。平时党的民主生活活跃，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在政治思想运动中就经得起考验，不会出大的偏差。每个党员必须过党的组织生活，把自己放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有个别干部党员长期不过党的生活，脱离了党和群众的监督，经常违法乱纪，等问题被揭发出来，已经烂掉半截了。我们要吸取教训，一定要坚持党和群众对干部进行监督的原则。机关支部更要重视这一工作，应该好好抓一抓。

党内有大量的问题是要通过谈话来解决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都要做好谈话这项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同群众谈话。群众的智慧是宝贵的，往往一个领导干部遇到了问题，自己闷了好几天想不出个名堂来，和群众谈谈话，群众两句话就给你点破了。谈话是联系群众做好工作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谈得好是不容易的，这里重要的问题是要有平等待人的态度。下级干部或者是战士找领导谈话时，往往有种种顾虑，鼓了很大勇气才敢谈出心里话来。领导干部一定要坐下来，耐心地听，不要嫌他罗唆。群众往往看你的态度讲话，你态度好，他就愿意说，你简单粗暴，他就把真相隐蔽起来，把你封闭起来。谈话决不能从印象出发，对人抱成见，这是最有害的。即使对方有缺点，也要先耐心听他讲，看他缺点在哪里，设法帮助他改正。一个同志向你讲了很多意见，总有一些是好的，对

改进工作有帮助，就应该虚心接受。这样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不等人家把话说完就给顶回去，不准别人讲话，结果“阎王爷开店，鬼都不上门”，群众意见听不到，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平等待人的作风，这种作风在我们建党建军的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毛主席要找哪个干部谈话，总是先通知门卫，下雨天还叫警卫员拿着雨伞到门口去接，谈话时亲切耐心，平易近人。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正面的意见要听，反面的意见也要听。特别是同基层干部和战士谈话，更要这样。他们谈的往往是一些日常生活问题，一定要细心听，不要怕麻烦。群众对领导提意见，不论从哪个方面提出，都是有好处的。党的方针政策，很多都是要从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解决思想问题常常要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要很好听取群众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研究分析，把问题弄清楚，然后采取措施，教育群众，解决问题。这就是毛主席说的，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善于同群众谈话，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这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应提到共产党员的党性上来认识。

了解和研究下级党委的工作方法。组织部门应该在党委和政治部首长的领导下，经常了解和研究下级党委执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情况，以及下级党委委员之间的团结和党委会议生活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总

总结经验，提出建议，以改进下级党委的工作。目前有些党委包揽行政事务，没有充分发挥行政首长和机关的作用，同时也降低了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这种现象必须改进。党委应该抓方针政策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经过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然后由委员分工负责执行，充分发挥行政干部和机关的积极性。只强调集体领导，不明确个人分工负责，是搞不好工作的。有些党委执行上级指示时，生搬硬套，不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对下边统得太死，这种现象也必须改进。

检查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各项决议指示的执行情况。这是组织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检查工作，应从调查研究入手，要把检查工作、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三者结合起来。要多搞些典型调查，认真帮助连队总结经验，使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的决议指示真正落到实处。

政治机关的工作要具体、切实，不要粗枝大叶，不要一般化。组织部门的干部，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建党学说，要加强党性修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锻炼，发扬党的传统作风，成为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组织原则的模范。

终生难忘的怀念

莫文骅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我曾与毛泽东同志有过许多接触，得到过他老人家许多教诲和帮助。虽然岁月过去了很久，往事却历历在目。

一

我最初听说毛泽东这个名字，约在 1926 年。当时，我的家乡广西南宁风雨如磐，民不聊生。在太平天国革命遗风的影响下，民变蜂起，农民的革命要求十分强烈。1925 年春，韦拔群同志从广州彭湃同志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后，在桂西北东兰、凤山一带，开展农民革命运动。在传闻中，我们知道了这次农民运动已大大不同于太平天国，而是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农民运动。而且知道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由毛泽东主持的，他是代表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讲习所的。

南宁是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城市之一。1926 年 12 月，我在省立第一中学念书时加入了共产主

义青年团。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我和其他一大批同志先后被捕。在狱中我未暴露政治身份，但经受这次斗争磨炼和教育后，更坚定了革命意志，也体会到赤手空拳是对付不了反革命的。1928年2月我出狱回家，二姐夫邓绍棠（当时在旧军队中当营部书记）来看我。闲谈中他说：“朱、毛吹来吹去，现在吹起军队来了，在江西有了红军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红军，心中十分高兴，结合狱中的体会，懂得必须组织革命的军队，进行武装斗争。

1929年12月，我党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雷经天、韦拔群领导的百色武装起义胜利实现，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起义的政治纲领中提出“迅速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会合”，并把它作为具体行动口号之一。我有幸参加了起义，在军部当中尉参谋。这也是我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中逐步认识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观点的起点。

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党中央命令，准备“打柳州、桂林等城市，而后向广东小北江方向发展，阻止广东敌人向北，以配合全国红军夺取武汉”，即在立三路线错误指导下，离开左右江地区，挥师东进。沿途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浴血苦战，到达桂东北全州时，部队已损失1/3以上（原来7500人）。红七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接受了这一严重教训，决定放弃立三路线，取道湘、粤边，到江西去找朱德、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红军。1931年1月在湖南道州听到了朱、毛红军在江西活动的确切消息，大家非常高兴，感到

有希望摆脱困境了。

1931年4月，被迫拆散分为两部分的红七军，历尽艰险危难，终于先后到达湘、赣苏维埃区，与该区红军会师。一到湘赣，我们耳目一新。感受最深的，一是看到新建的苏区政权，看到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的高昂革命热情，看到亲切温暖的军民关系，看到根据地那种情绪热烈融和，到处是欢声笑语的乐观气氛。这对于一直在国民党区险境中孤军奋战的红七军来说，不啻是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二是到达后与湘赣独立师及红二十军一起作战，连战皆捷。湘赣红军和苏区人民都盛赞红七军英勇善战。当时，部队已大大减员，我先后任红五十八团四连政治委员和六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那时连改为指导员），并任红七军军委候补委员。在与部队共享胜利的喜悦时，大家都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红七军的战斗作风不谓不勇敢顽强，由于没有革命根据地而在国民党白区行军作战，往往吃败仗，被动挨打，到了苏区就能打胜仗。苏区的军民关系这样好，打仗时群众热烈支援，有时出的民工担架比部队还多，保证每个伤员都能救护下来，使我切身感到革命根据地万分重要。我们从实战中认识到，红军这样团结，官兵关系这样好，大家上下一心，协调一致，这都是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政策的结果，是我们迫切需要学习的。于是在作战间隙和休整时间，我们抓紧向苏区红军学习。先学群众工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游击战略战术等，接着又学习阶级分析、红军内部的民主制度、军政纪律和作风等等。经过学习，认

识提高了，眼界宽了，对毛泽东同志日益敬仰。这时，我们早已不停留于“到中央苏区会合朱毛”的口号，而是努力按照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方针原则建设部队。1932年7月，我们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又经过第三、四次反“围剿”等实战锻炼，红七军发展壮大起来，归属红三军团指挥，真正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那时，红七军只剩1300多人。

但是，直到这时，我还没有见到过毛泽东同志。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听说有AB团捣乱，中央军委调红七军去叶坪保卫中央，说是毛泽东同志要来讲讲话，大家非常高兴，但后来未见到，部队又调走了，甚为失望！直到遵义会议后，总政治部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毛泽东同志向中央红军总直属队和群众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时红八军团撤销，任宣传部长的我，在总政治部待分配工作。听报告时，我挤到主席台前，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闻名不如见面，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多么幸福啊！以后，我被分配到红军军委上级干部队（即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任政治委员和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在长征中紧随总直纵队行军，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这才经常见到毛泽东同志。

二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方面军干部团与四方面军

的军事学校合编，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政治委员由四方面军的同志担任。刘少奇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但他们都未到职。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任教育长，临时主持学校工作。我任党总支部书记，临时主持政治部工作。学校驻在党中央驻地毛儿盖以西约 10 里地的卡英。当时，张国焘已经把他与党中央的路线分歧公开到部队，斗争开始激化。有一天，李特冲着我说：“你们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很散漫，着装不整齐，精神不振，表现出右倾。”我听了很吃惊，当即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干部团是很有战斗力的，在长征中立过大功。李特听了我的解释发起火来。这时正好一位衣衫褴褛、一手提着个羊头，一手拿着个土罐子的一方面军干部从窗下走过，李特就指着他说：“你看他像什么样子！这不是向困难投降吗？向困难投降还不是右倾机会主义？”我立即反驳说：“这是休养连的病号。他原是独立师的政治委员，带病坚持跟部队走，说明他对革命是坚决的，怎能说他是向困难投降，是右倾机会主义？你的逻辑不对头啊！”他见我这样说便没有再谈下去。次日，李特约我去谈谈，先请我吃苞米糊糊，这在当时是难得的。又郑重地提出来：“我们昨天谈的事，你再想过没有？干部团是右倾机会主义啊！承认它，好转变。”我说：“没有这回事承认什么？”他又问我：“你读过书吗？”我说：“读过一年半中学。”他忽然严肃起来说：“那么你是知识分子喽，难怪不坦白承认错误！”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因为我知道张国焘歧视知识分子。在四方面军，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

是很危险的。又一想，李特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是军政大学的学生，论文化他比我高，就讥讽地说：“我哪能谈得上是知识分子！如果我也算个知识分子，也只是个小知识分子。那你教育长同志不就是大大的知识分子了么？如果说不承认错误是小知识分子的特点，那么，造谣生事就是你这样大知识分子的特点喽！”他听了脸一沉，沉思了一会，没有生气，反而笑咪咪地问：“你过去干过什么工作？”我说：“当过参谋、辎重队长、连长、连政委、游击队临时总指挥、军分区司令、师政治部主任、军团宣传部长、上级干部队政委，最近是干部团的政治处主任。”他说：“象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我听他话里有鬼，便说：“在一方面军，象我这样的干部多得很，我算什么。”就这样谈了半个多钟头，话不投机，我起身要走。他又郑重地说：“这个问题你得慎重考虑啊！”我回答说：“你得收回你的不正确言论。”

我回来一想，李特这些话决不只是一般闲谈开开玩笑。这分明是借诬蔑干部团右倾来攻讦党中央，并且挑拨离间，搞小组织分裂活动。这一情况必须向上级反映。第二天我带着身边的两个同志去毛儿盖。先到上级干部队找肖劲光、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李一氓、冯雪峰等几位熟悉的同志，征询他们的看法。他们尤其是冯雪峰同志支持我向上级反映。于是我找了总政治部代主任博古同志和副主任李富春同志，把经过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两位领导听了非常气愤地说：“要和他继续斗争，要发动群众批判他的错误

观点。”还说要把这一情况立刻报告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因天色已晚，他们让我住一夜再回去。次日早，富春同志来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可以继续和李特的错误观点作斗争，但组织不宜出面，还不是时候。因为当时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还没有完全认清张国焘的错误，所以发动群众斗争李特是不合适的。”我听了感到毛泽东同志胸怀宽广，谋虑深远，决心回去照他的指示办。走到村边，陈赓同志等着向我询问此事。他支持和鼓励我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继续斗争。

回去后，李特可能觉察到我已向党中央汇报此事，不再和我谈这个问题，只谈些具体工作。但我发现，当部队转移时，李特总是派出几个警卫员跟着监视我。不久，四方面军的一个军长何畏来任政治委员。我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他，建议他作必要的处理，但他不吭气。

过了草地，到达巴西一带时，部队已普遍知道党内关于继续北上抗日还是回师向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争论，都非常关心，议论纷纷，气氛有些紧张。有一天早上约4时左右，李德突然来到我床边把我叫醒说：“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即到。你把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同时，要防备他整你。”李德虽是“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重要决策人，但仍是中央军事顾问，当时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路线的。我意识到，他来叫我，是军委示意的。就急忙召集有关人员动员布置，派青年干事张正光到骑兵团长苏进处，告诉他立即出发随